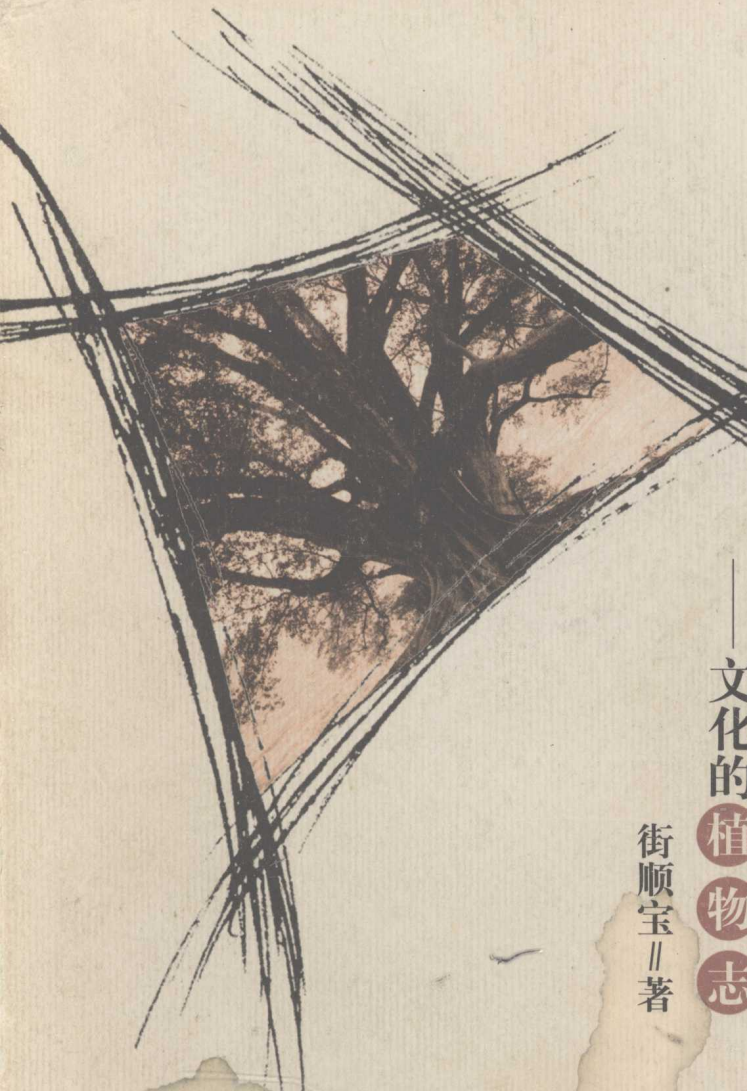


边地文化丛书

# 绿色象征

文化的植物志

街顺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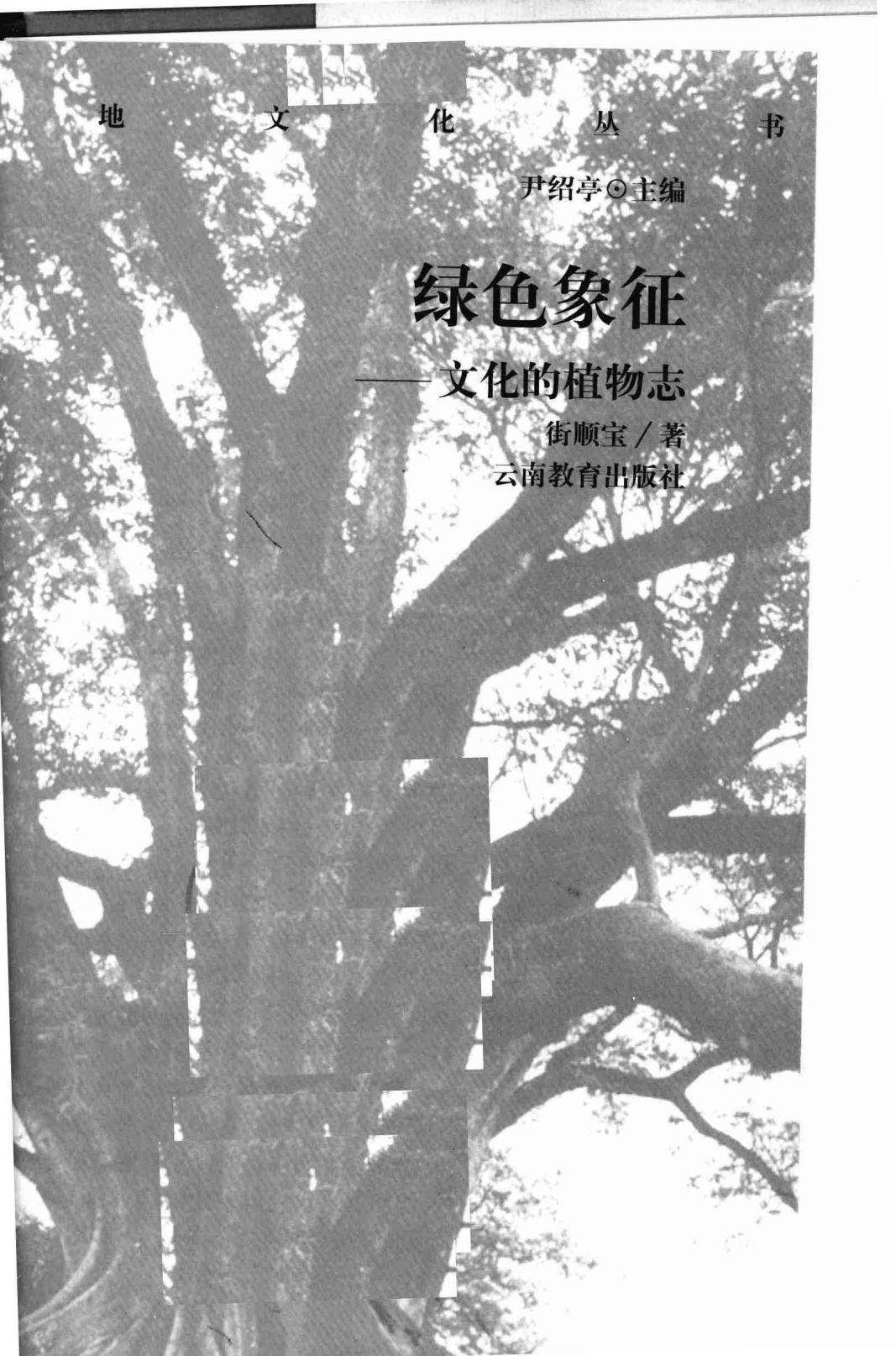
地 文 化 丛 书

尹绍亭◎主编

# 绿色象征

——文化的植物志

街顺宝 /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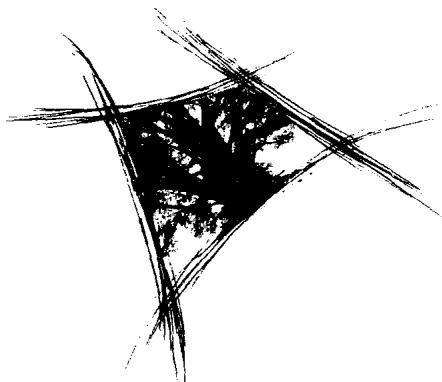
绿色象征——文化的植物志 / 街顺宝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8

(边地文化丛书)

I. 绿... II. 街... III. ①植物志 - 云南②植物 - 文化 - 研究  
IV. Q948.5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0064 号



责任编辑	高建勤
封面设计	向 炜
版式设计	陈 俊
责任校对	马建生 刘 润
责任技编	汤家力 荣 景

书 名	边地文化丛书 绿色象征——文化的植物志
著 者	街顺宝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昆明市书林街 133 号)
印 装	昆明西站彩印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30000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7-5415-1806-9/Q·3
定 价	19.00 元

## 序 言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由于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历史上被称做荒外蛮徼。中原王朝历来有比较强烈的区分中心和边缘的意识，“中国”一词，就是集中的体现。感觉上地理位置居中，民族便显得尊贵和高傲，文化也自视高人一等，于是就有了“北狄、西戎、东夷、南蛮”的称谓。云南作为南蛮边地的印象，一直沿袭下来，以至很多人今日说到云南，仍然马上会想到山川险阻、瘴疠迷漫以及大象、孔雀、异域人种……

然而，也并非所有的内地人都不了解云南，“美丽、神奇、丰富”，就是内地作家徐迟对云南的由衷赞美。最近几十年，随着交通的改善，信息传媒的发展，云南就像一位美丽的少女，走出了深闺，向世人撩开了神秘的面纱，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边地与内地的不同。对于客观存在的差异，过去都习惯于从进化的角度去审视，即认为差异的原因是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使然。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观点，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文化差异现象，于是便有了各种理论的探索，“地域文化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仅从字面上看，“地域文化”就比较科学，以地域区分文化，承认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相对性与多元性，着实是一个崭新的理

念。不仅如此，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兴起的地域研究，还包含着跨学科、比较研究、持续发展等很多内容和方法论。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域类型丰富，民族文化多样性突出，积极开展地域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和极有意义的。

这套“边地文化丛书”，可以说就是地域研究的实践和成果。以地域研究的观点视之，所谓“边地”，并无蛮荒边徼的意思，而是强调地域特征；所谓“边地文化”，也并非是指搜罗原始文化和奇风异俗，而是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的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自然，说到云南的地域文化，那是一个宏大、丰富、深邃的渊藪，该丛书只不过是其姹紫嫣红的花海中的几簇花朵。不过，由于“土壤、气候”的特殊，这几簇花朵虽小，却也放射着夺目的异彩，散发着奇异的芳香。《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把我们带进了我国最后的刀耕火种“王国”，透过烟与火的迷雾，深刻地揭示了山地民族与森林的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和祈愿》，搜集、研究了云南各民族祈愿吉祥和幸福的诸多象征物象，读后给人以文化和审美的双重满足。《绿色象征——文化的植物志》，是神奇的植物文化的揭密，是民族植物学领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依据石寨山最新发掘的宝藏，从新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享誉中外的滇国青铜文化。从以上的介绍不难看出，该丛书的选题是比较精彩的，然而从地域文化的整体角度来看，它又显得比较单薄。云南地域文化的研究，理应还有许多重要的领域和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期待着“边地文化”之树苗茁壮成长，枝繁叶茂，百花烂漫。

尹绍亭

1999年10月28日

# 目 录

绪论 文化植物与文化植物学·····	(1)
第一章 宇宙树与生命之树·····	(15)
第一节 宇宙树·····	(17)
第二节 生命之树·····	(23)
第二章 神树与神林·····	(33)
第一节 神树·····	(36)
第二节 宗教植物·····	(49)
第三节 神林·····	(58)
第三章 植物神灵与灵力植物·····	(71)
第一节 植物神灵·····	(73)
第二节 通神植物·····	(82)
第三节 插祀植物·····	(93)

<b>第四章 镇恶驱邪植物</b> .....	(103)
第一节 洁净植物 .....	(106)
第二节 镇慑植物 .....	(111)
第三节 驱除禳解植物 .....	(123)
<b>第五章 吉祥植物</b> .....	(137)
第一节 风木雅竹 .....	(140)
第二节 名吉物吉的植物 .....	(150)
第三节 芳草名花 .....	(153)
第四节 嘉禾与仙药 .....	(158)
<b>第六章 礼仪植物</b> .....	(167)
第一节 年节礼仪植物 .....	(169)
第二节 生活礼仪植物 .....	(178)
第三节 婚丧礼仪植物 .....	(190)
<b>第七章 表意植物</b> .....	(203)
第一节 暗示与标识植物 .....	(205)
第二节 传信植物 .....	(210)
<b>主要参考文献</b> .....	(277)
<b>后记</b> .....	(287)

绪  
论

文化植物与文化植物学







人通常都以一定的方式来认识接触的事物，或得出结论，或获取知识。这种知识或结论一旦成为定式，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类的思维活动与生产、生活。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除了利用植物为人类生存与生活服务外，还人为地赋予植物许多来自人类自身思维活动的文化内涵，使植物成了文化的载体，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植物，就是这样的植物。

植物学有许多分科，植物分类学是其中的一门，许多学科都依赖于这门以鉴别、分类与命名为主的基础学科。分类学的成果，主要体现为描述准确、分类与鉴别科学的植物志。有了鉴别与科属分类、物种命名之后，由于出发点与侧重点不同，还有许多既与一般的植物志密切相关，又有很多特殊之处的专门植物志，如中药药用植物志、用材植物志、农作物志之类。文化植物的研究，也属于这一类的科目，其成果也可以体现为文化植物志。而通常对它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植物学，其定义方法与药材学、木材学之类相同。

这里所指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与精神产品，属于意识领域，不指哲学上的广义文化，也不指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文化植物学是研究与意识活动和精神世界有密切关系的植物的专门学科。它是植物学与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许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

与文化植物学关系最密切的是民族植物学。民族植物学的概念出现在 19 世纪末，当时主要指美国原住民的植物知识和对这种知识的发掘与研究，英文作 Ethno - botany，是民族与植物学的组合。这个定义算不上科学，还带有一定的定义偏见。这里的民族，是指与殖民者和外来人相对的原住民，以及他们认为较落后的民族。在实际操作中，它所承担的任务是与文献和学院系统相对的民间植物学的研究。任何民族都有民间流传的传统知识，并不限于所谓后进民族。民族植物学一名概括不了这门学科，称做

民间植物学，似更准确、科学，这里只是借用流行说法。

民族植物学涉及民间对植物的各种知识与利用，文化植物学只强调精神文化领域涉及植物的部分，只能算民族植物学中的一部分。

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可以算文化植物学比较传统的研究领域。一种植物的驯化、培育，与生产发展水平有关，又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有些植物就很难移植到不同的环境中。幸好大多数的栽培植物都有较强的适应性，这就造成了狭小的原产地与大范围传播两个相关又相反的结果。一种植物驯化成功，是人与自然很多因素的综合成果，值得研究与借鉴、利用。而栽培植物的传播过程，更是一个民族迁徙、人口流动与文化传播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通过研究栽培植物的传播过程，可以揭示许多历史与文化问题。葡萄、石榴、苜蓿等植物由中亚传入中国东部，马铃薯、玉蜀黍、向日葵、番茄等由新大陆传入旧大陆，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重要事件，背后隐藏着许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与不朽功绩。在植物物种传播过程中，保留原名或重新取名，也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一定时期的记录中，中国汉族对外来物种，若不用原名，都以番、蕃或洋之类的字作标识，如番麦（玉蜀黍）、洋芋（马铃薯）、番茄之类。其他民族也用一定的办法来处理这种问题。以彝族为例，洋芋、洋茄子（佛手瓜）等为借用，玉蜀黍称“左驳”（滇南），属新取的名称，构词法以性状描述为主，“左”强调其可食或用于食用，“驳”是描述锥柱状的词。

中国国内流传的物种，取名则多采用冠地名法，如党参、川芎、怀地黄之类，明确标注该植物原产地或利用发源地分别在山西的上党、四川和河南怀庆，带有明白的地理文化印迹。

有一些植物的传播，是随文化传播而来的，这类植物在某地的出现，表明此地与这种植物原产地的文化有着错综复杂的联

系。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普遍种植与崇拜菩提树和贝叶棕，是因为接受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把印度的崇拜植物移植了过来。

透过植物本身，可以发现许多深藏其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植物文化带就是明显的例子。对植物的利用与崇拜，无不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植物利用与崇拜相似，体现的是文化相同或有共同的文化渊源。

在从西伯利亚到欧洲西海岸的广阔地域中，有几种神奇的植物联系着很多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如白桦、白杨、桤木之类。他们对这些植物在信念、神话与崇拜方面的相似，体现的是一种渊源极深的古老文化。作为古代游牧民族的走廊，迁徙往来不断，带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并使文化跨越了民族的界限。文化相似，让我们有机会推断这种文化的渊源，在于从匈奴帝国到蒙古帝国等强大游牧帝国文化的遗留，而不是偶然的巧合。

在亚、非、欧三洲交界地区，一个很大的范围之内，由对无花果的崇拜而形成的无花果文化区，也体现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古埃及，无花果是生命之树的原形，《圣经》中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用无花果的树叶来遮羞，其来历可能在于古老的埃及文化。

在云南，对云南松和同属一些植物的崇拜，则体现出与共同的民族渊源相联系的文化相似性。这种崇拜跨地域、跨民族，表面上看，十分复杂，但实际上，这种崇拜主要在藏缅语系民族与汉族之中，壮侗语系民族、孟高棉语系民族与苗族、瑶族，都很少见。再把汉族文化与内地作对比，我们就可以肯定这种崇拜的渊源在于有共同历史文化渊源的藏缅语系民族的传统文化，汉族是受他们的影响。

高山栲 (*Castanopsis delavayi* Franch.)、黄泡 [*Rubus obcordatus* (Franch.) Nguyen van Thuan in Aubrev. et T. Blot]、五倍子树

(*Rhus chinensis Mill*) 在宗教与民俗崇拜中的使用, 也体现为群体文化间古老的渊源关系。因为这些植物在上述情况下的使用, 主要出现于彝语支民族与景颇族、阿昌族之中(后两个民族主要用高山栲与黄泡, 五倍子树是否用, 未得证实), 而这些民族间关系是最亲近的。从语言讲, 景颇族中的载瓦支系与阿昌族的语言, 很多人将其归入缅彝语系这样一个大语系之中, 历史上他们与彝语支民族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这有很多线索可寻。由此可以肯定, 这是一个有共同来历的文化在植物上的表现。

黄泡叶, 佤族、汉族也用, 但不见有内地汉族使用的记载, 我们可以认定云南起源观点。与佤族关系最近的布朗族、德昂族、傣族等不用, 可以认定佤族是受其他民族的影响。高山栲有时也用同属的小果栲(*Castanopsis microcarpa Hu*) 等一些植物代替, 因为民间分类将它们当做一类, 称为锥栗。

端午节挂菖蒲与艾, 由汉族地区扩散, 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区。受汉族影响, 中国的许多民族也接受了这种风俗。

槟榔、榕与柃叶文化带, 则更多体现为地理文化特征。因为这几种植物都是湿热地区生长的植物, 对它们的利用或崇拜, 也体现为地域性特征。就槟榔来说, 嚼槟榔首先要有这种植物的果实来源, 其起源与扩散都会限制在湿热地区。柃叶的一些用法, 云南的傣族、布朗族等民族, 与广东古时候的习俗非常相似, 如用于垫柱脚一类, 当出于古代的越人。有民族文化渊源关系, 也体现地域特征。榕是湿热地区的植物, 从中国的台湾、福建、广东、广西、云南, 到东南亚与南亚次大陆, 都有不同程度的爱护与崇拜现象, 有一些内容是文化传播造成的, 但更多的还是地理与气候等原因造成的。所涉及的民族众多, 语言、文化与历史各异, 崇拜方式不同, 没有共同文化渊源可言。

葫芦文化带, 主要在中国西南与南方地区, 表现在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与洪水神话之中。人从葫芦中出来或借葫芦度洪水劫

难，是很普遍的神话传说，汉藏语系与南亚语系许多民族都有，可以看做一种文化传播与互相影响的结果，但究竟起源于哪个系统的民族，现在还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

芝麻杆文化区，主要在华东与华北的汉族地区，以芝麻开花节节高的说法为理由，在除夕之夜把芝麻杆放在门后，以图吉利。

世界上的农作物文化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与气候条件，却也可以找到许多影响其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移民与文化移植对农作物品种的影响，就是明显的例子。

就像历史上蒙古人圈占中原汉族地区的良田为牧场的历史事件一样，很多农作物品种的选择也决定于文化传统。饮食习惯一旦形成，很不容易改变。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发生波士顿倾茶事件的话，今日的美国人肯定还会以茶为主要饮料。在农作物品种的选择及由此形成的农作物地理分布带背后，可以找到很多的历史、文化联系，远不止是地理条件造成的农业带这样一个简单的范畴。

药材与香料贸易通道，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大的影响，其作用远远超过了转卖香料与药材获利的目的本身，它对文化传播与人类交往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就中国而言，西北的古代丝绸之路与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是著名的香料与药材转运商道。产于西亚与东非等地的乳香、没药与产于印度与东南亚地区的许多药材和香料，多由海路运到中国，长期以来受到中国人的信赖，备受推崇。而由中国传入欧洲的粟、高粱、樟脑、大黄等，也有过神奇的经历，以樟脑、大黄最为突出，远不像中国人对待它们那么简单。

从上述这些不多的例子即可看出，文化植物的种类很多，而植物文化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对它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很广，学术意义也是多方面的，很多领域，前人都不太在意，值得我们去

整理研究。

中国记载文化植物的历史非常早，先秦时期即有丰富的资料。《山海经》记载有能使人不迷、不惑、不溺、不忧、不蛊、不愚的一些植物，不可能是出于物性验证，应是记录民间传说，只能看做一种文化现象。由此也可以看出，植物物性认识上的虚拟构想与对这种认识的传播很早就有。在《山海经》的一些逸文中，还解释了挂桃符、贴门神这种后世流传极广的风俗的来源，也就是神荼、郁垒与大桃木的传说。

秦汉以后的文化植物记录，也屡见不鲜。比较著名的典籍，从先秦始，止于秦汉，有《诗经》、《礼记》、《墨子》、《庄子》、《论语》、《吕氏春秋》、《淮南子》、《风俗通》、《白虎通》等。汉以后有（晋）张华的《博物志》、（晋）葛洪的《抱朴子》、（晋）干宝的《搜神记》、（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宋）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其中，《太平御览》尤为重要，这是一本按类书体例编成的书，按类搜罗了很多前人的著录材料，有的古书已佚，材料只保存在这部书中，尤显珍贵。

纵观前人的记述，可以把古人对文化植物的著录材料分成民俗、宗教、信物、仙药、祥物几类。民俗类又分作岁时、婚丧、礼仪等用途不同的几类。岁时类植物以端午节悬挂的菖蒲与艾、重阳节佩的茱萸与泡酒饮用的菊最是有名，来历也早。婚丧礼俗用植物则如石榴、栗子、荔枝、枣之类，都有吉祥含义。石榴喻多子，以为吉利，南北朝时即有记载。宗教植物的详细记录，以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为多，对佛教礼仪植物菩提树、贝叶棕的记述，非常详细，但也有失误。信物类植物，《诗经》中有提及，《木瓜》一篇把木瓜、木桃等果实的传送，引申成了思想的交流与情感的传递。三国时曹操给太史慈送当归，也是借物表

意。从真实可信的药草，无限制夸大成神奇的仙药，也是流行一时的植物文化现象，（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可谓集其大成。宣称得到秘传仙方的葛洪在这部书中罗列了许多据其所言可以长寿成仙的植物，并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其实都是虚言。美花名草、吉花祥树的推崇与称颂，自古有之，数不胜数。

在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资料中，不论国内国外，都有很多文化植物的调查记录。对一些植物的迷信与膜拜，曾经是人类学家很感兴趣的问题，也让他们惊奇不已。他们通常都把它当做文化现象记录下来，但由于不是特意收集，多是零星见于各种调查材料之中。

植物学家深入到与自己的原生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区进行植物调查的时候，对各地在植物上的文化遗留及对植物的文化理解，都会感到新鲜，无法漠视。如果是在云南，谁都不会忽视掉各地都有的神林，以及各地居民对神林的不同态度。

从这个角度讲，近代以来形成的植物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无疑都有一些植物文化的资料积累。问题在于它们都不是自觉的有目的的研究，而是随意性很强的记录，既不科学、系统，也不完备。植物学家的工作重点，从传统到现代，都不会放在文化方面，所以，植物学家即使记录文化内涵，也不会作为主要方向，不会对植物所负载的文化作深层的研究阐发，多属一笔带过。文化的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一类学科的任务，因为文化植物是整体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它经常会在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的调查资料中出现。人们对其文化的挖掘、阐发多数也都很好，遗憾的是，这类调查资料，或疏于注意，或限于学识，几乎没有见到对所记录的植物作详细的识别或作科属分类的。除了少数常见植物不需特别说明人们就能辨别以外，大多数都难让人有明确的认识，若想辨认，只能重新调查核实，这就相当于没有做植物记录。简单的例子，如松与柏，过去没有科学的植物分类系



统，也不讲求精确的识别命名，统而言之，也无不妥，但在植物学很发达的今天，植物的识别已很细，泛泛而言，自然谁也弄不清说的是哪一种，无法利用。更有甚者，有的记录由于弄不清种属，只记录方言称法或很少用的民族语名称，离开调查点，就变得如同天书一般，莫知所云。一般的书籍资料，又不可能附有植物的图片，自然达不到记录这种植物的目的。比如说，一种植物的景颇语名称叫做匈攀，谁会知道它是一种忍冬科的植物，汉语叫水红木（*Viburnum cylindricum* Buch. - Ham. ex D. Don）。这样，就在几个学科的一个交叉点上出现了一个缺环，对研究工作的准确、科学势必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我们提倡文化植物学的出发点，就在于弥合这个缺环，提醒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太重视的研究领域。我们没有必要要求植物学家转来研究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只能要求人类学家掌握一定的植物学知识，在文化调查中提及植物的时候，能够准确描述。同时，虽然文化植物学是几个学科的交叉点，但它自己也有很多独到的研究领域，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所要做的工作，是对以前的记录作归类整理，再搜集、调查民间保存的材料，提供相当数量的例证材料，建立文化植物学作为专门学科的内部构成与理论构架。

对文化植物的兴趣与注意，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我本人对植物的特别爱好。基于爱好，不论是对植物学文献或是野外的植物都花费过很多的精力。自小的生活环境，又是在一个有几种民族与文化的社区，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文化植物，引发强烈的好奇心。如在节日活动中用到的植物，留下的印象就很深。到后来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民族与文化的时候，就特别留意对照不同文化中植物崇拜与利用的相似与差异，并在文献阅读与田野调查中不断进行积累，逐步归纳出宗教植物、民俗植物与传信植物等一些类别，当做一个完整的课题来考虑。

1997年9月间，偶然与尹绍亭先生谈及这个问题，尹绍亭